

命運多舛，成就天宮--中國航天二三事

論 壇	中 美		US-CHINA FORUM
中美元壇主編			
社務委員: 張紹選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惠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傅 中 范湘濤 張文基 蔣社長			
每週六出刊 第412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2021年4月29日中國航天在海南文昌基地用長征五號B遙二運載火箭成功將空間站天和核心艙送入預定軌道，中國空間站在軌組裝建造全面展開。

6月17日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發射升空與天和核心艙成功實現自主快速交會對接後，航天员賈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標誌著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的空間站。至此中國航天實現了本世紀初的預定目標，下步就是在本世紀中葉前實現載人登月。

中國的航天事業始於上世紀50年代，1956年二月開始的，當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1956年四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工業委員會，統一領導中國的航空和火箭事業。聶榮臻任主任，黃克敏、趙爾陸任副主任，航空工業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的航天事業創業的開始。

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製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任院長。這就是中國航天史上著名的“老五院”，也是中國航天創始的日子。

成立伊始，聶榮臻元帥（時任副總理）對向中央報告“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的方針，1956年10月17日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批准了這個方針。這就是老五院的建院方針。六十多年來，在這個方針的指引下，中國的導彈、航天事業戰勝的重重困難，不斷發展壯大，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發展之初，中國政府尋求前蘇聯援助，蘇方只同意接收50名火箭專業的留學生和提供兩發教學用的P-1模型導彈（即蘇聯仿製的德國V-2導彈）。1957年根據“十月十五日協定”蘇聯相繼運來幾種導彈樣品和相關圖紙、工裝、設備和幾批技術專家，為中國的航天事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然而在學習、研究和仿製的過程中，1960年8月12日在老五院的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中蘇關係破裂。

在這種情況下，聶帥指示老五院：一定要爭氣，依靠我們自己的專家，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仿製P-2導彈決不能動搖，無論如何也要搞出來。

斷奶的過程是痛苦的，然而也是成長的過程，是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第一代航天人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從仿製中學習，從學習中獨立研製，走出了中國航天自己的路。從仿製P-2開始，打造出赫赫有名的東風系列戰術、戰略導彈，“東風快遞、使命必達”成為火箭軍響亮的口號。

在發展導彈的同時，為人造衛星發射而研製的運載火箭也開始了研製，運載火箭與戰略導彈大同小異，研製工作比較順利，於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首次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成功。從此中國航天事業開始軍民結合的道路。

1984年4月8日，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三號火箭發射了東方紅二號試驗衛星，4月16日成功定點於東經125°赤道上空，是中國第一顆地球靜止軌道通信衛星，星上配置2個C波段轉發器，可在每天24小時內進行全天候通信，包括電話、電視和廣播等各項通信試驗，開始了使用我國自己的通信衛星進行衛星通信的歷史。

轉眼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四化總得有先後，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忍耐幾年。”這就是後來的“軍隊要忍耐”。

由於中國航天與中國軍隊的特殊淵源，這段日子也是航天最晦暗的日子，大量基地、工廠關停並轉，培養多年的科技人才、優秀技工離開航天。保留的科研院所、基地和工廠也無軍品任務，各種型號下馬或者擱置，大面積發不出工資，有病無法治療，內部矛盾激化，發生不少悲劇。當時有句流行語：“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就是當時最真實的寫照。

航天為紓解困難，更為留住人才，同時軍隊也要養人，同時也是為裁軍需要。於是，1986年沙特親王來到我國商談購買彈道導彈事宜時，沙特的金錢對於中國來說也是天降甘霖，雪中送炭，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最後，經過一年左右的談判，沙特以35億美元的天價購買了我國36枚去掉核彈頭的東風3號彈道導彈。要知道當初的

◎王文軍

35億美元可是全部的外匯儲備，所以，在當時算是解決了我國缺錢的燃眉之急。

這期間也是中美蜜月時期，航空工業與美國有過“和平典範”項目（又稱“和平珍珠”計劃，國內稱82工程）。世界向中國打開一條門縫，看到了差距，然而剛剛開始的市場經濟，眼花繚亂的外部世界，讓一些人認為能買來一個現代化，認為為西方世界打工能換來一個現代化，“和平典範”計劃中就放棄了大飛機的研製。

而航天工業方面為保科研與生產骨幹，開始面向國際市場要飯吃，因為中國長征火箭的可靠性、先進性與價格低廉，獲得了國外訂單。

1988年6月28日，澳大利亞衛星公司與休斯國際通信公司簽訂了，價值高達3億8000萬美元的合作（當年北京人薪才2000元人民幣）。衛星是美國為澳大利亞製造的，是美國最高科技的產物。美國政府對此次發射頗為重視，他們非常害怕中國藉機偷學衛星技術！1988年12月7日，中美兩國簽署了有關衛星發射服務的三份備忘錄，其中《關於衛星技術安全的協議備忘錄》就是限制中國科技人員的行為。在這些規定下，中方人員沒有任何單獨機會接觸美方製造的衛星。

1990年4月7日21點30分，發射由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為亞太區域通訊服務而研製的區域性通訊衛星，亞洲一號“衛星。中國的“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從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順利升空。這是我國第一次國際商業發射，結果非常圓滿。

1992年3月22日，我國按照合同，發射了澳星B1衛星。在按照程序發射期間，兩台助推火箭發動機沒有成功點火，導致發射失敗。根據合同，我國必須將衛星送入軌道才算成功，那麼我們必須再次發射。1992年8月14日，澳星B1再次發射並取得成功。

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1992年12月21日19點20分，“長征二號E”搭載澳星B2升空後，澳星B2卻發生了爆炸。

1996年2月15日，新型長征三號乙大

推力運載火箭首次發射國際通信衛星708。由於一個電子器件的失效，使得慣性基準傾斜，火箭按錯誤的姿態進行姿態矯正，導致火箭在飛行22秒以後，觸地爆炸，星箭俱毀，發射失敗，造成8死57傷，是中國航天史上一次重大事故。

此次事件使中國航天對外發射服務徹底陷入低谷，直接導致中國航天部門徹底進行質量整頓。其實這一切與當時人才流失的大環境有關，因此出台了《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強化科研生產管理的若干意見》（簡稱“72條”）以及《關於強化型號質量管理的若干要求》（簡稱“28條”），它們和此前總結出來的“雙五條歸零標準”等一起，成為了航天領域質量工作的指導和規範，與之配套是待遇的提升，並迎來了此後運載火箭發射15年的連續成功。

中國航天真正的轉機發生在1991年，當年一月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盟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為恢復科威特領土完整而對伊拉克進行了戰爭，稱海灣戰爭。完全現代化的立體戰、信息戰，打響的軍隊高層機械化、大步兵軍團、火炮致勝的思維。

“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成為中國軍隊的新時期建軍指導性思想。信息化的首要條件是什麼？衛星通訊，GPS定位，數據鏈的收發傳輸，這都離不開航天。在軍隊要忍耐的前提下，一些擱置下馬的項目開始恢復，航天開始重新規劃，由此中國航天開始涅槃重生，一發不可收。

人說十年磨一劍，航天人是三十年礪箭。

嫦娥五號，北斗系統全面建成，天問一號，高分十四號衛星，長征五號B火箭，長征八號火箭，長征十一號火箭，神舟系列飛船，直至太空宮間站順利運營，標誌中國航天終於成為世界上最具頂尖的航天強國之一，而且是完全獨立自主發展起來的中國技術中國製造！

中國航天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中國人自強自立的象徵！與中華民族復興同步發展！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始會員。

台灣島內的抗疫攻防戰

◎謝正一

台灣過去一年半以來的抗疫表現，相當不錯。民間，因為民眾營養水平夠，防疫措施自動自發做得挺好的。但最近這次已超過一個半月的防疫（三級警戒），因為民眾的（自肅），等同自動（封城）。從五月中旬開始，因為疫情感染和病故的人，相對過去的數字，的確令人恐慌，人心浮動。然而，若和國外比較，包括日本和歐美，台灣疫情從統計數據來看，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最近，因為打A-Z疫苗的關係，85歲以上的死亡人數有些嚇人。然而，若從防疫指揮中心發佈的數字來看，這個數字，仍然可以接受。只是感染者的死亡率超過4%，世界的平均數在約2%，顯示出台灣染疫的統計死亡率太低了。因為以台灣的醫療體系來說，死亡率應該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個人認為死亡率高的原因，和防疫指揮中心不願積極篩檢感染者有關。因而感染者沒有被檢測出來，成為了無症狀的帶原者，也就成為了感染源。這些帶原者，除非發病，也許就自己好了，成為有免疫力的人。

偏偏台北市長柯文哲和新北市長侯友宜等，因為萬華茶室的群體感染，逼得他們拼命找可疑地點篩檢，也不是普篩，是老百姓自願來篩，或是辦公場所，發現感染者，強迫全體員工普篩，所以雙北市的統計數字，為全台灣縣市之冠。究其原因，是其他縣市不主動篩檢站，也不想主動篩檢老百姓。反正想把感染者的黑數蓋住，賭賭運氣，表示自己管轄的區域防疫工作做得很好。這是關心台灣疫情發展的人，理應了解和知道的事！

民進黨政府，面對五月開始的疫情急遽升高這件事，束手無策，因為買的疫苗進入台灣的，少到令人懷疑沒有買！於是向日本和美國要疫苗支援，日本給了124萬劑，美國給250萬劑，連同自己買的已抵達台灣的100萬劑，總計接近500萬劑。台灣全部疫苗覆蓋率，與台灣2300萬人口來算的話，也只有10%左右。世界衛生專家普遍認為有效

的覆蓋率，應該是75%，台灣還差2500萬劑、如果至少覆蓋人口一半來計算，台灣還差1800萬劑。

台灣的救世主終於出現了，鴻海集團郭台銘，公開表示要捐500萬劑疫苗、佛光山佛教團體，也表示要捐500萬劑。但民進黨當局就是提出各種條件阻止郭台銘等民間團體，自購國際疫苗的行為。最近可能擋不住了，蔡英文就找台積電陪郭台銘，一起到總統府見面。蔡英文好像同意的樣子！緊接著，慈濟佛教團體也要捐500萬劑疫苗。這樣加起來一共有1500萬劑疫苗，好像可以勉強過關！至於台灣政府採購的，好像沒聽說過何時會抵達台灣。防疫指揮中心，對於政府購買的疫苗，都是打啞謎。以上是台灣疫苗取得的大概發展情況。

當然，台灣國際疫苗取得困難，民進黨都說是大陸阻止的，現在民間要自救，自己要想辦法買。否則台灣因為沒有疫苗而死亡的人，眼看就要迅速竄昇。蔡英文搞了老半天，除了大陸阻止的理由以外，原來民進黨及其利益追隨者，在等台灣的高端生技公司等製成疫苗上市，此外還有聯亞公司。這兩家還沒生產還沒做第三期有效性實驗的疫苗，就要公開給台灣民眾使用。而且現在民進黨政府已各自下單買500萬劑，這就是〈政治疫苗〉。當然，民進黨只有阻止郭台銘等人的疫苗進來，民進黨人的圖謀才會得逞。台灣人的命，真的無法掌握在自己手裡嗎？萬一，這支台灣自產的疫苗，打死更多的人，怎麼辦？最近一個月，打A-Z疫苗的死亡人數已經累積到170人左右。台灣的防疫工作，怎麼會搞到這樣糟糕的地步？總而言之，就是民進黨一直在唬爛台灣老百姓，所謂超前部署，碰到飄升的疫情，連收容感染者的地方、救命器材和藥品等嚴重欠缺。買不到疫苗，推

一個台灣旅美華僑如何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姜國鎮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關於中國現在的領導人習近平的事情。對某些人來說，這說不定是個很敏感很想避開的問題；但卻是一個關係國家大計，中國未來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壞，總是一個很重要的，也是很複雜的話題。原因是這是個仁見智，又因地，因族別而異，各有其所好，各取長短，愛憎分明的話題。一般來說，在國外的華人，大概是因為受西方媒體和價值觀的影響的關係，用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的角度和價值觀來衡量的話，自然而然對他的所作所為就有許多意見和批評了。而國內的人呢？其實據很多資料顯示，除了完全反對派系的人之外，一般的民眾對習近平的觀點還是比較正面的。

其理由大概有以下幾條吧？第一是“反腐”的成效。因為歷代政府雖然高喊“反腐”，可總是雷聲大雨點小，而習的反腐，雖然沒有達到制度性的改革，卻已到了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感覺得到的層次了（比方說“限制三公消費”等）。而對於難上加難的軍隊的反腐習也很有作為，排除萬難，不僅做好了軍隊的反腐，更提高了中國軍隊的士氣。第二是疫情的控制以及全國脫貧的成功，經濟和生活的提高，帶給了全國人民一個新的希望（如果你有機會看看他訪問那些窮鄉僻壤的鄉村時，他的那種為窮苦老百姓所道出的真誠的語言和出自內心的感人話語時，你會感覺得到那些歷代領導從來沒有表現過的，也無法說出來的真正為民的純樸之心）。第三也是大家引以為傲的高科技發展和載人航天工程的開發和成功，而且這些幾乎都是這9到10年的發展，也就是習就位以後的發展項目。

這些一件一件的業績都比較深得人心，也給了人民一個精神上的支柱。而對我這樣一個居住於海外的華人來說，因為或多或少也受到西方媒體和輿論的影響，“反習”就相當正常了。而我為什麼從“反習”，逐漸演變成“挺習”，個中原因就不止上述的那些表象而已了。

眾所周知，在近代史上，中國受到了太多不可言喻的列強的欺侮和侵略，而其中之最當屬日本的侵略和蹂躪。而中日關係雖然不是驚鴻駭浪，可也是此起彼伏，險象叢生。而對這段日本的侵華歷史，中國歷代領導當然都是義正辭嚴的反駁日本政府歪曲這段歷史的行為，可總是因為一些內在和外在的原因，對日本的態度就有些態度模糊，更甚者，有時還用對這段歷史的批評與否來做一些跟日本政府交涉的政治籌碼。我們

給大陸阻撓，民間要自購，也設條件阻止。原來是要用才完成二期安全實驗的疫苗，給台灣人用。這就是台灣一年半來，防疫工作從所謂資優生落入放牛班的原因。

此外，我們認為民進黨老是拿中共來作為事情辦不通的理由的這件事。北京政府理應有正確又可行的理由來回應。不要每次打高空，不是指責民進黨胡說八道，查非事實，就是〈以疫謀獨〉的語言，彼此打高空放煙火。我們以為把話挑明說，例如，台灣當局如果以所謂官方名義來與國際來往，理應以奧運及世貿組織的模式亦即採用〈中華台北〉的名稱，這樣不就行了嗎？兩岸政治問題已經理不清，剪還亂，大陸只要公開表明底線在哪裡，不就彼此好辦事？千萬別把台灣民眾當刀俎。台灣人也明白，道理在哪裡！我們期待兩岸彼此在防疫問題，能夠把話說清楚講明白，不要為難台灣一般民眾的需求，這才是兩岸相處之道。

作者：謝正一，台灣工黨名譽主席，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會長，台灣佛光大學教授。

舉兩個例子吧？第一個就是“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在中國的教科書上一直到1978年為止都沒有受到重視，而到了1982年日本爆出了教科書淡化其侵華歷史的時候，南京才開始籌劃並促成了南京紀念館的建成。而在當時和我們一起到南京開會的荷蘭人記者（Ian Buruma）所描述的南京紀念館是這樣的：一個一見就覺得有點可憐，而且財務上沒有受到多少資助的南京紀念館。裡面的照明設備有一半是不亮的，展示品也都是從複製品再複製的東西，那些混凝土的牆壁上都有發霉的味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政府和政府們就更變本加厲的鼓吹“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後來成為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花花公子雜誌的採訪中，重複地說道南京大屠殺從來沒有發生過，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其後很多日本的大臣們，像中曾根的手下藤尾正行，到竹下內閣的奧野誠亮，一直到最近安倍的文相極右派的櫻井佳子，這一系列的人都持這種觀點。而中國歷代政府的對日本歷史的“忽隱忽現”的強硬或柔軟的態度，更容易給了日本錯誤的信息，而助長了他們的氣焰。

一直到習近平就任以後第二年2014年2月27日第二十二屆人大常委一致通過立法形式通過將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國家公祭日，使得對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的紀念上升為國家公祭，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2014年12月13日，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出席首個國家公祭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公祭日上講到：南京大屠殺慘案鐵證如山、不容篡改。就這樣，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的紀念終於成為國家公祭，而奠定了歷史的定位，對日本的歷史篡改者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吧！我覺得這應該是習近平的功勞。我還記得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時的興奮和感動，一個值得我們中國人高興的消息，也是我們在紐約一直努力不懈的奮鬥有了它的價值。

而另外一件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棘手的中日間的歷史問題，那就是“釣魚島”的問題。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歷史問題，可經過美國從中操縱和精心的佈局，把一個本來根本不屬於日本的釣魚島給委託給日本管轄，而美國本身根本就沒有這樣做的權利，也沒有經過聯合國的授權。而中國的歷代領導，從鄧小平的“擱置”，到後來的模糊政策，甚至多方阻撓了對日本政府抗議的愛國保釣人士的漁船的出海。因為這樣就讓日本海警船橫行，甚至逮捕了我們的漁船和人員。我們這些海外的保釣人士也都只能忍辱負重，掩面而淚下罷了。這樣的政策，不僅是中國大陸，本來應該主張是台灣領土台灣當權者也都要縮頭縮尾，不敢做強硬的主張，更不用談派武警或軍艦去伸張主權的行為了。可就在習上台那年，2012年，中國政府派遣了海監船開始定期在釣魚島及其附屬領域開始了編隊巡航！從以上的習異類觀點，我認為這十年來，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從所有客觀的角度和實際的結果來看，中國確實是朝著真正的強國為民的洪決大方向邁進，希望中國會更好，更強，更為民。為習近平乾杯！為中國乾杯！

姜國鎮：台北建國中學肄業，1978年畢業於日本國立九州大學醫學院。加州大學醫學院麻醉師科畢業。現在在紐約行醫。精通日文，從事多項日本發華研究，現任〈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會長。

Time to Establish A World Media Organization (WMO)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to establish trade rules, regulate agreements, settle disputes,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onitor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and among its 164 international members. WTO, established in 1995,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world trade and enhancing world economy. In its 25 years of history, the world trade has quadrupled in dollar amount, 2.7 times in volume size and two times in world GDP \$80.9 trillion in 2017. With limited resources on Earth, cooperation in product development, labor shar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material recycling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The more trade in the world signifies more collaboration, more prosperity, more interaction and more cultur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owards a harmonious global community. WTO has made a ver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uman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world prosperity where trade is a key element. People are perhaps also familiar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s the directing and coordinating authority on international health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WHO adheres to the UN values of integrity, professionalism and respect for diversification. WHO works worldwide to promote health, keep the world safe, and serve the vulnerable people with a goal - people hav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health emergencies protection, and better health and well-being by focusing on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quality of healthcare,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financ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llection. These objectives require global cooperation to achieve.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HO is so critically important in dealing with a world-wide health challenge. The pandemic has revealed that the global community must work together in fending off such a natural disaster. The world needs an effective vaccine working for the entire world population, not just for one nation or one contin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UN needs to establish a World Media Organization (WMO) to define guidelines and rules about public media and to regulate its oper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maintaining a peaceful and culturally enriched global community. In the following, we present the arguments for the need of such a worl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media have blossomed and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e Chinese first invented the printing (206 BC), woodblock printing (8th century CE) and Gutenberg, a German, first created the printing press (1450). With the advance of electronic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atellites today, we hav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flourishing in our everyday life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with print materials, web pages, e-books, television and a rich set of social media delivering v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rough words, documents, music, pictures, movies and ever creative digital media encompassing all of the above. This is seemingly a blessing for the mankind except the unregulated proliferation of media also creates harmful problems. Yes, we are in an information age. However, the above scenario also describes a tremendous quantitative byte-assault on human being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xplosiv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benefits delivered by vast amount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eem to be covering up the pitfalls and the devil being released by the media explosion. The U.S. media industry is of the size of \$703 billion dollars projected to reach \$803B by 2021. What is the problem with the fast growing media industry today? There are actually too numerous to elaborate in detail here except by broadly group them in some categories for discussion. We shal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problem categories of media to strengthen our arguments for advoc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WMO: I. Rhetoric in the Media We talk about this first because its effect is seriously changing the behavior of nations. The rhetoric are destroyi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 and creating hostile conditions leading to war or at the minimum generating hatred among nations. Are all rhetoric based on fact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are not. Furthermore, with continuous rhetoric, people get brain washed and hatred turns into violence. This has been happening among people and nations too numerous to elucidate here. What we need is a neutral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ike WMO to regulate the rhetoric issue. II. Fake News (Fake Information) Fake news is a broad category affecting all elements of societ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t contributes to the above category, rhetoric, making its effect worse. Before the media revolution, print media dominated. Because of the technology limitation and cost involved, the print media was far more self-regulated than today's multimedia (including the print media).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had a rigorous editorial procedure and authors had a

higher moral principle which was destroyed or deteriorated today under the so-called freedom of speech. The end result is that the amount of fake news is so overwhelming, they twisted the fact and truth. People have too little time to make ver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learning population (not just young kids and students but also adult learners) they get misled, the damages are often too difficult to correct.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ike WMO can help make the verification and regulate the fake news. III. Dangerous Speech (Criminal in Nature) The freedom of speech also created another heaven for 'dangerous speech', dangerous information can create personal, societal, national and even international danger. Spreading terrorism, indoctrinating evil and hatred thoughts, luring innocent minds into cult-like organizations and advocating violence and 'revolutions' against existing legal systems are all dangerous speeches that serve no good purpose. Again, there are many incidences of violent crimes created which can be traced to media influence. We need an interna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 back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dy to prevent and remove these dangerous speeches. IV. Information and Data Security The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make information and data readily collectible and easily distributed. Personal private data, corporate business data and even national security data can be vulnerable due to hackers or malicious organizations of various sources. Safe guarding of these data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In our global community, the protection of such sensitive data and information definitely requires an interna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 to police such crimes with clear rules to regulate and severe punishment to deter criminals. The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media crossing national boundary is especially of concern in this category.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one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e need of media regul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setting b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cently, rhetoric, fake news, dangerous speech and data security issues have vividly appeared in world media, for example, on COVID-19 pandemic facts (origin of virus, fake conspiracy theory and accuracy of health impact data) or on Uighur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fake stories of genocide and concentration camps, smearing rhetoric on forced labor). The establishment of WMO is no less important as the WTO and WHO which have served the world well. We urge the UN to take an initiative to create such an organization quickly.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